

秦始皇传

外国人眼中的秦始皇

[英]吴芳思 / 著

王纪卿 / 译



CS 湖南人民出版社

秦始皇传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英】吴芳思 (Frances Wood) 著

王纪卿译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始皇传 / (英) 吴芳思 (Wood, f.) 著. 王纪卿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438-9736-6

I. ①秦… II. ①吴… ②王… III. ①秦始皇(前259~前210)—传记—IV. ①K82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7157号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by Frances Wood

Copyright ©2008 by Profile Books Limit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by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秦始皇传

著 者 (英) 吴芳思

译 者 王纪卿

出 版 人 谢清风

策 划 人 周 政

责任编辑 夏光弘

特约编辑 张德才

装帧设计 元明设计

内文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03月第1版

2014年0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9736-6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中外交流由来已久，自传说中秦时徐福东渡扶桑，至汉唐东西方交往日炙，再至近代以来中国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之中与世界融为一体。伴随这种交往与融合，中国逐渐为世界所了解和接受。迄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之一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因制度、文化、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中西方之间的误解和歧见，并未因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贸易的紧密联系而消弭，反倒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制度和文化的壁垒。

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对话，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并接受中国，除了我们主动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之外，同样也需要我们去了解世界。如何了解世界，或许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体认世界其他国家看待中国及中国人的惯常思维及评价方式。

“思享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系列丛书即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旨在通过译介外国人著述的有关中国的人物、事件、制度、文化等方面的传记及其他类型图书，让国人从中体悟他们看待中国的独

特思维、独特视角，以此来反思和确认中国在全球文化视野下的真实影像，找准世界眼光中的中国，从而更好地与世界融合，与其他民族和谐并峙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系列丛书所选译的均是海外有影响的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畅销书作家或曾见证中国历史变迁的亲历者，译者亦多为该领域的研究专家，并且所有译文都经编辑人员据原文认真核定，以便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但由于我们编辑人员的学识水平有限，其中难免错讹之处，敬希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有机会重印再版时更正。

湖南人民出版社

目次

引子

大象、蒸鸭与战国 / 001

第一章

虎狼之心 / 021

第二章

《太史公记》与睡虎地 / 036

第三章

狡猾的丞相 / 042

第四章

牛仔与印第安人，或儒家与法家 / 048

第五章

法律责任的身高 / 060

第六章

防御工事的类型：长城 / 071

第七章

焚书 / 082

第八章

统一 / 094

第九章

上林苑与万客殿 / 105

第十章

长生不老药 / 121

第十一章

水银海、珍珠星与八千人之师 / 130

第十二章

秦始皇与伟大舵手 / 150

附录一

秦始皇帝：有关传说、科学与民族主义 / 159

附录二

秦始皇帝 / 183

附录三

秦始皇的崇龙情结 / 205

引子

大象、蒸鸭与战国

中国始皇帝（公元前259—前210年）引发非中国人士关注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陕西省临潼县晏寨公社的西杨村需要一口新水井。1974年，村民在打井时，发掘出了“兵马俑”的军人塑像，这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

对于现在参观兵马俑的数十万名游客而言，这些军人塑像比他们设定要护卫的那个人更值得注目。然而，在中国，始皇帝的重要性被其恶名所掩盖了。他是中华帝国的创立者，帝国官僚统治之父，这种官僚体制统治其广阔的领土达二千年之久（令伏尔泰与莱布尼茨大为赞赏）。对于他有效创立的官僚统治阶级而言，他是一名可怕的暴君，是智力生活与历史文化的敌人。

未来的始皇帝出生于公元前259年，他是秦王的长子与继承人。秦国位于中国西部，处在今天陕西省渭河流域的中央，不过

始皇帝的祖先据说是从甘肃省东迁而来的。这种“域外的”家系，远离再往东去接近黄河（今天郑州市附近）的中心区域，促使传统的中国考古学家将秦国称为“夷狄”之国，暗示秦始皇帝家喻户晓的暴虐是其非汉族出身的结果。^[1]

渭河是中国大规模河流动脉的一部分，从西向东穿过干燥的黄土高原，然后流入黄河，其交汇处正是黄河向东奔向大海的那个拐点。所谓“黄土”，是随风飘舞的细小泥沙，在雨水很少的地区，它能保持相当的湿度，对农人而言是一种幸运。黄土还容易挖开，所以有很多人居住于在垂直的黄土峭壁上挖空的窑洞里。^[2]耕作主要局限于河谷。

在秦始皇帝出生以前半个世纪，秦国已开始扩张，征服了位于现四川省境内的蜀国，将其统治向北延伸到黄河的鞍形弯道地区。征服的过程在秦始皇帝治下仍在继续，他将此过程称为公元前221年的“一统中国”。

新帝国的版图从今天的北京以北直到南方的广东省北部边界，从陕西省和四川省境内黄河北流的路线直达东部海滨。和直接的前辈皇帝们相比，秦始皇帝疆土的幅员是巨大的。^[3]

更加值得注意、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尽管汉朝将其统治延伸到了甘肃走廊，与中亚和丝绸之路有了接触，并进入了福建和广东，但中国的幅员在几个世纪中仍然大致如此。直到19世纪，清朝的皇帝们将这个国家向北、向西扩张，实施了一个庞大的开拓方案。

中国最早的居民，于公元前约5000年开始定居下来从事农业，他们在考古学上的特征，是以其居住地域、其从事的农业

和其独特形式的陶器来划分的。尽管他们直到最近仍被分为两大类，但考古发现在继续扩大其数量和地理范围。这些群落中的大多数为山脉与大河所阻隔，肯定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特性。

在西部，沿渭河两岸，是为种植玉米的“彩陶”文化所覆盖的地区，其红粘土的坟墓装饰有黑色的漩涡形图案，而在东部，则是一种这样的文化，其陶器的发展最终有了定型，其特征是抛光的黑色表面，以及复杂的铰接形状，不同于彩陶的曲线形。再往南，在长江两岸，地方文化产生了有线条痕迹的陶器，人们在那里耕种稻谷。^[4]在某些地点，黑陶文化似乎有向中部东移的趋势，移向今天的河南与山西两省。三足鼎陶器形式的出现（预示了青铜器时代的三足鼎）以及玉雕的产生，表明了这种特殊的文化在此后中国人工制品的典型发展中所具有的意义。

传统的中国历史记载说，最伟大的创造性神秘人物之一，即“治水者”，是夏朝的一位统治者，他以开挖通向大海的渠道来防止洪水，解决了中国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尽管有人怀疑夏朝的存在，而“古史辨派”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明确地表示了这种怀疑，但考古学家们姑且将最近发现的一个黑陶文化的遗址归于夏朝，而将青铜时代的开始归于大约公元前1900年。^[5]

不管夏朝是否存在过，在公元前3000年，显然在中国已有无数定居的群落，从西向东沿渭河与黄河分布，直至山东半岛，并自黄河向南分布。这个地区从“中原”开始，向东延伸，便是中国腹地。许多殖民区为发育良好的处于围墙之中的村庄，建有宗教仪式中心与单独的墓地。

传统的中国史料说，夏朝之后便是商朝（约公元前1570—前1045年）。20世纪初的考古学发现表明，商朝位于中原，在渭河与黄河中游两岸，国都为安阳。商文化的特点是使用青铜武器与器皿，后者是用陶土铸模铸造的，通常展现出复杂的雕刻装饰。对于商代，不但可从传统的历史中去了解，还能从所谓“甲骨”即牛骨和龟壳上所刻的文字中有所发现。这些甲骨被占卜者用于测试神祇是否赞成计划中的行为（例如狩猎或战争），以及试图预言疾病与分娩的结果。有些铭文，例如谈到月食的文字，已被用于推定准确的日期，但人们充其量认为，大多数此类材料仅仅是对其出产的时期提供了相关的指引。^[6]

商代疆域的幅员也难以确定，但其主要遗址显然都集中于中原。^[7]公元前1045年，商王战败了，周朝取得政权。尽管关于周朝的发源地还有争论，但在其夺得控制权时，他们似乎已定居于西部，栖息于渭河及其北方支流的流域。^[8]周朝的疆域图并不确定，虽然它是建立在传统文献与考古学证据的基础上，其显示的是中原的同一个移民区，但遗址的数量沿着长江下游及更远处而大大增加了。^[9]由于统治区扩大了，周王们决定任命贵族统治不同的地区，他们往往将法案铭铸于青铜器表面以志纪念。^[10]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由于地方统治者主张其权力，这个体系逐渐解体，周朝的疆域形成一种局面，人们不大准确地称之为“多国”体制。^[11]

到了公元前5世纪，分裂的局面已很明显，在公元前481—前221年这个时期，形成了人们后来所说的“战国时期”，七个大国的国王及其较小的对手们争夺最高权力。^[12]在这一时期，虽然黄河中下游各国仍然是最重要的，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却更有势力，将



用龟壳占卜

中国的统治向南延伸。

秦始皇身为秦国的王子时，通过他对所有敌对国王的征服，打垮了独立的诸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从辽东半岛直至海南岛的整个区域。于是，他将大陆所有的独立而各异的文化整合到自己的统治之下，包括其各不相同而互相隔离的历史、信仰与人工制品。其中包括四川平原，该地在三星堆发掘出了大型青铜车轮和与真人等大脸如面具的加长青铜人像；^[13]包括中山国，其地出产铸有复杂花结与坚实螺旋线图案的大型青铜器；也包括伟大的楚国，那里有萨满教的僧道，以及怪诞的木头灵神，它们生着鹿角和长长的红舌。如今这一切都是一个统一帝国的组成部分。^[14]

尽管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但公元前221年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其农业主要是谷物生产。农庄上养猪饲鸡，马和牛被用作力畜——主要是在北方。人们养了少量的绵羊，以获取羊毛。这些牲畜都是放牧于田地的边缘。中国没有放牧大群牲畜的传统，但在长城以外，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边界以外，草原上的百姓则是牧民。

那时的风景和现在大不相同。如今中原的“黄土”腹地以细小的黄土为特色，完全是光秃秃的，而且的确很黄。但在战国时期，在始皇帝的时代，山坡上可能覆盖有灌木丛，而如今密集耕种的土地上，很多地方会有树林植被。当时的人们首先要将土地扫清，以方便狩猎的开始。林中空地形成后，骑士们可以在其中追猎森林动物，然后会交给农夫们。晚至公元前120年，仍然有报告说，在河边稀疏的树林里，无数的大象、老虎和犀牛，络绎不绝地穿过华北。



大象

在中心腹地周边流淌的黄河，对始皇帝而言，其名称只有一个“河”字，部分是由于它在该地区的重要性，部分则是因为，在山坡上仍然有树木植被而草原尚未被农业占用的时候，河水中可能只带有较少的黄色泥沙。^[15]中心腹地属于暖温带，生长着每年落叶的阔叶树，温度在冬季落到冰点以下，而在夏季升到摄氏二十六至二十八度。这里降雨量不大，尤其是在内陆，这意味着“旱地耕作”是一项冒险的事业。在战国时期，人们致力于控制“河”的水流，在离河岸背面十千米处修筑河堤，以容纳季节性的泛滥，但始皇帝在即位之后不久，便将农夫们调去开垦肥沃的洪水冲积层地床。由于上游的森林采伐与防护削弱，黄河在这时便开始了其淤塞、泛洪与改道的漫长生涯，使之得到“中国之忧患”的名声。^[16]

始皇帝在西部和南部征服的土地，提供了不大一样的气候与环境。在温暖无霜的南部和西部，降雨量较大，虎潜山林。这里生长着奇异的树木，如樟脑树和梓树。不过，随着铁斧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到来，森林采伐便开始了。得到的木材通过江河与运河输往全国，用于建设各种形式和不同大小的建筑物，也用于燃烧

窑炉，以生产陶罐、瓦片、排水管，并最终生产始皇帝陪葬军队的兵马俑。

治水是必要的工作，不仅可以将木头从帝国的一个地区运往另一地区，而且能够灌溉田地、控制洪灾。当始皇帝征服西部时，其领土包括了岷江的灌溉网，而这个网络今日仍然可见。为了浇灌四川平原，人们采用一套设计了弯道的复杂方案来定期地疏浚河道。这些弯道将淤泥的沉积导向运河内侧较慢的水流，然后将其冲刷至下游。运河由大竹篮控制，其长或为三米，其径或为一米，其中填满了大圆石。这些填满了石头的篮子可以按照要求搬动（很困难，并需要很多劳动力）。^[17]

早期灌溉与治水的另一计划是在中心腹地开挖运河，时当公元前246年，始皇帝还是秦国的统治者。人们将泥沙很多的水流沿一条等高线导入洛河，有助于减少土壤中的自然盐分，因为沿着其上游区域它会将水流释放到田地里，给其浇灌并施肥，于是有助于给腹地和始皇帝京城里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粮食。始皇帝登基后不久，有人说运河对始皇帝成功地统一做了贡献，因为它改造了碱性土壤，使腹地变得肥沃，因而令始皇帝的国家变得“富有而强大”。^[18]（这条运河存留了大约五百年，直到其主要的支流之一逐渐沉入河床。^[19]）始皇帝开创了另一个运河系统，在他征战南方期间将粮食和其他供给品从长江运往广东。这个系统运用江河与一条运河，创造了一个长达二千千米的内陆水道体系，今天仍在使用。^[20]

在战国时期，农夫们开垦地方统治者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在田地里耕作时，有时会使用状如叉子的铁铲、牛拉的铁犁、锄

驢轉筒車



水利

头、耙子、镰刀与收割刀。^[21]每年播种、种植、收获的季节会举行一些仪式，统治者制定的历法规定了这些必须遵循的节气。在干燥的北方，节气的把握不如播种方法那么重要。为了从土壤的湿气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必须将种子播在间距适当的直行之中。在较为潮湿的南方可以广播种子，但为了获得最高的产量，对于稻谷必须更加精心地培育和移植。^[22]

有证据表明，人们有时会将野草犁入田地，用作“绿肥”，但各种动物的副产品似乎用得更为广泛。“合厕所与猪舍为一”似乎是一种早期的发明，尽管人们并未大量地饲养牲畜，但对其粪便却认真收集，并将之制成堆肥。蚕粪作为肥料的价值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有了记述。^[23]

所有的统治者都关心农业管理，希望它能养活百姓，使之不会造反，并产生赋税收入。在统一前的秦国，当局采取了措施，防止农夫们接近林场和池塘，担心他们得到免费的木头、鱼、龟，而不集中精力生产粮食。警官们在乡间巡视，确保百姓以最佳方式从事农业，并劝勉百姓“积极劳动”。^[24]

在田地里劳作的农夫们穿着长袖或短袖的束腰宽松上衣，长度及膝，布料是米黄色的未染粗麻布，内衣为朴素的便装，而其裤子或下面的裹腿方便在下地干活时卷扎起来。他们头戴用灯芯草或稻草编成的圆锥形帽子，或者形状有点像长袜的那种帽子，在始皇帝陪葬兵马俑中的一些军人头上可以看到。如果下雨，他们会披上粗布或灯芯草缝制的外套。中国农民在稍后时期所穿的靛蓝染色的特色服装，似乎直到始皇帝在位期以后才被采用，当时禁止农夫们穿着染色服装的规定已经放宽了。^[25]普通妇女穿着